

作为“一个事件”的座谈会

——“世界史的立场和日本”与“近代的超克”

段世磊

竹内好对于“近代的超克”的重新思考，引起日本思想界一定程度的注意。日本思想界分别于1963年和1964年在日本学术杂志《思想》上以“近代化特集”为题展开座谈会。这两次座谈会特别关注了京都学派哲学学派“存在论”的东洋哲学构造在“超克”西方近代历史中哲学思想的认识论上的二元论的作用。

太平洋战争前后，日本思想界举行了两场有名的座谈会，一场是发生在太平洋战争开始前的“世界史的立场和日本”座谈会，一场是发生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近代的超克”座谈会。其中，作为“世界史的立场和日本”座谈会的思想成果，也因为陆军与海军政治上的影响而存在着太平洋战争前后观点指向上的细微差别。因而可以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作日本思想界具有里程碑性质的一个事件，引发人们有关日本思想双重性特征——即对于西洋来讲，日本是亚洲，而对于亚洲来讲，日本是西洋——的思考。正因为这种文化内在的矛盾，生发出对于太平洋战争的矛盾性评价——战争本身所具有的“殖民主义战争和反殖民主义侵略”的两面性。

1941年11月23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前13日，京都大学的四位学者，高坂正显、西谷启治、高山岩男和铃木成高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座谈会分三个主题，分别为“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东亚共荣圈的伦理性和历史性”、“总力战的哲学”。尽管有三个主题命名，但实际上座谈会上大家畅所欲言，观点并非集中，大多是自说自话、自由讨论，引发了众多发散性的思考。但是，在随后经陆军统制而以《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为标题发表在《中央公论》上的单行本中，却有着思想僵固的统一形式，失却了座谈会现场生动活泼的一面。1965年，在发表于《中央公论》昭和四十年八号上的《大东亚战争与京都学派——知识人的政治参与》一文中，大岛康正从一名“世界史的立场和日本”座谈会的亲身参与者的角度，追忆了此次座谈会召开的过程，尤其考察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座谈会本身的讨论与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处于陆军政府统制之下《中央公论》审核出版的座谈会的内容上的区别，并由此指出战前、战中以及战后，京都学派的哲学学人们对于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抵抗和反抗的态度。大岛康正通过将京都学派的立场视作是陆军政策的反面，顺利地将其自身的立场与当时尚属清醒的海军的思考内容紧紧地捆绑在一起，赋予两者之间思想和精神上的一致性。也正是这一点构成了此后日本国内外学者为京都学派思想意识形态上的纯理论性的非实践性操作特征进行辩护的有效视角。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的1942年，日本召开了“近代的超克”的座谈会。主要由文学界、日本浪漫派、京都学派三个群体构成的此次座谈会，针对覆盖日本和亚洲地区的西洋霸权，展开应该采取何种立场的讨论。对于大多数参与者来讲，现代性意味着西洋化，即资本主义、殖民地主义或者是新教主义的推行。而正是因为这些主义在当时陷入了行之不通的状态，所以才展开试图通过日本传统超越并克服这种状态的讨论。理查德·卡里奇曼（Richard Calichman）就此座谈会召开的情景进行了如下说明：

座谈会“近代的超克”于1942年7月23、24日在东京召开。当初，召开座谈会的想法是由文学评论家、原左翼成员龟井胜一郎提出，与另外两位《文学界》成员河上彻太郎和小林秀雄一道进一步提炼了这个想法，选取了当时日本思想、艺术、科学领域内的代表人物作为座谈会的参加者。日本浪漫派指导性的存在保田与重郎没有参加的有名的例子除外，全员承诺参会。加上前面提及的三个策



《「近代の超克」と京都学派—近代性帝国普遍性》书影，作者酒井直树、磯前順一。

划人，参会者包含以下人员：诸井三郎（作曲家、音乐研究家）、吉满义彦（天主教神学家）、西谷启治（京都学派的宗教哲学家）、下村寅太郎（科学哲学家）、津村秀夫（电影评论家）、菊池正士（物理学者）、铃木成高（京都学派的历史家）、中村光夫（文学评论家文学研究者）、林房雄（无产阶级文学作家）、三好达治（诗人）。从其共同点来看，这些人多少代表三个群体。文学界（龟井胜一郎、河上、小林、中村、三好、林房雄）、京都哲学派（西谷启治、铃木成高、广义上的下村寅太郎）、日本浪漫派（龟井胜一郎、林房雄）。……此次座谈会的主要目的是围绕日本的新的精神秩序，克服安逸的无反省的言说。为此在实体性的术语下揣摩明治以来日本的近代化和西洋化现象。（Richard F. Calichman, "Introduction: 'Overcoming Modernity': The Dissolu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in *Overcoming Modernity: Cultural Identity in Wartime Japa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9-10）

通过回顾过去70年间围绕“近代的超克”所展开

的学术讨论的历史，从中汲取对于今时今日的问题有益的论点，是当下的任务。实际上，首次战后重提此次座谈会的是竹内好于1959年发表的《近代的超克》一文。此文是针对1957年日本文化论坛“日本文化中的传统与文化”而写。论坛虽是在战后召开的，但包括像西谷启治、铃木成高、高坂正显等座谈会“近代的超克”，以及1941年召开的座谈会“世界史的立场和日本”的京都学派的成员也都参加了此次论坛。

竹内好将论坛的目的概括为：“违背主张在亚洲的主导权和超克西欧近代的原理的国民的使命观，在这里通过‘日本=西欧’的观念操作，以简单明快地保留前者而舍弃后者的方式得到解决。这是自传统的脱离，并非真正的解决。在于他们并没有什么值得困惑的。……此派的新文明开化论者的主张是，日本本不属于亚洲。”（竹内好：《近代の超克》，《竹内好全集》8，东京：筑摩书房，1989年，第66页）可以说，亚洲太平洋战争的失败，日本失去了亚洲的殖民地的同时，将自己视作是西洋的一部分，从而忘记了自己原是亚洲的一员而与西洋存在各种纠葛的事实，忘记了亚洲和西洋之间存在的难题。这是竹内好对于战后日本知识分子最重要的批评之处。对于竹内来讲，战后日本的知识分子由于将自己与西洋的近代主义者视作是同一的，便几乎对于如何处理自身身体和感情的问题采取等闲视之的态度。相反，“近代的超克”的座谈会却将这种问题提出并放在自己思考的范围之内。竹内诉诸战时的感情记忆和体验，以“需求生于感情和体验之中”的原理，重新审视那些因为抽象的表现而被隐藏起来的微妙的差异点。例如，在对外侵略的意

识形态之中，历史上萌芽而后立即被摘取的有关东亚的责任问题被隐藏了。

竹内好对于“近代的超克”的重新思考，引起日本思想界一定程度的注意。日本思想界分别于1963年和1964年在日本学术杂志《思想》上以“近代化特集”（座谈会：《特集：近代化をめぐる》，《思想》，东京：岩波书店，1963年，第11号。）和“日本近代化的再检讨”（座谈会：《日本の近代化の再検討》，《思想》，东京：岩波书店，1964年，第11号）为题展开座谈会。这两次座谈会特别关注了京都学派哲学学派“存在论”的东洋哲学构造在“超克”西方近代历史中哲学思想的认识论上的二元论的作用。宫川透在座谈会中指出，要克服近代，首先要克服日本历史上已经出现的以及很有可能在战后再次出现的将日本文化（和魂）实体化的危险。（座谈会：《日本の近代化の再検討》，《思想》，东京：岩波书店，1964年，第11号，第121页）为此，要对日本文化自身进行批判，并且将这种批判放在更为广阔的国际视野之中，在与国际社会进行比较的同时，认清自身的立场，从而明确，推进“近代化”的主体是谁，以此在不断壮大的马克思唯物史观体系和英美的“近代化理论”之外寻找日本特有的新的近代化理论的出路，虽然这种出路仍旧存在于马克思唯物史观所可能予以批判的视野之中。（座谈会：《日本の近代化の再検討》，《思想》，东京：岩波书店，1964年，第11号，第129页）

通过太平洋战争开始后的“世界史的立场